

宋元明清分册



陕西旅游出版社

长安史话

长安史话

宋元明清分册

本册主编 张铭洽

副主编 卢鹰

陕西旅游出版社

长 安 史 话

宋元明清分册

主 编：张铭洽

副主编：卢 鹰

*

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北工业大学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印张：9.25 字数：196千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5418—0201—8/K·47

定价：3.60元

《长安史话》编委会

顾问 史念海 林剑鸣 牛致功
李之勤 张 扬

主任 武伯纶

副主任 张铭洽 刘秉政 刘文瑞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世平	刘文瑞	刘秉政
卢 鹰	武伯纶	张文立
张铭洽	周生玉	贾二强
唐洪乐	常腾蛟	

责任编辑：钟晶晶

特约审稿：王国红

封面设计：王祚

插图：张建川

目 录

漫谈宋元明清时期的西安·····	李之勤 (1)
北宋与西夏在陕西的对峙·····	(10)
爱国宰相寇准·····	(16)
北宋名臣吕大防·····	(23)
书道渊藪与文化宝库——西安碑林·····	(29)
张载与宋代关学·····	(35)
平民山水画大师——范宽·····	(40)
宋敏求与《长安志》·····	(45)
苏东坡与凤翔东湖·····	(50)
耀州窑·····	(56)
保卫川陕的重要战役——和尚原之役·····	(62)
忽必烈在关中与安西王府的兴废·····	(69)
祖庵与全真教·····	(74)
明代的西安城墙·····	(80)
朱棣与秦王府·····	(84)
西安钟楼和鼓楼·····	(88)
漫话西安清真寺·····	(95)
一代权阉刘瑾·····	(103)
弘治状元康海·····	(109)
戏曲大家王九思·····	(115)
冯从吾与关中书院·····	(121)

科技之星王徵·····	(127)
泾阳崇文塔·····	(133)
蓝田水陆庵·····	(138)
关中大地震·····	(143)
明末陕西农民大起义·····	(147)
大顺农民政权定鼎西京·····	(153)
清代西安城区的布局特色·····	(160)
顾炎武在关中的交游·····	(167)
关学大师李二曲·····	(174)
乾隆状元王杰·····	(181)
毕沅与《关中胜迹图志》·····	(187)
关中农学家杨岫·····	(193)
农业经营家杨秀元·····	(200)
鸦片战争与西安·····	(209)
林则徐在西安·····	(214)
王鼎的悲剧·····	(219)
太平军、捻军在关中·····	(224)
清末关中的回民起义·····	(232)
戊戌维新志士宋伯鲁·····	(239)
慈禧太后在西安·····	(245)
赵舒翘之死·····	(253)
陕西咨议局·····	(259)
近代关中的新式学堂·····	(263)
秦腔源流漫谈·····	(273)
附：西安地区大事表（五）·····	(279)

漫谈宋元明清时期的西安

李之勤

在我国古代历史上，从公元 10 世纪到 20 世纪初年的宋元明清时期，处于封建社会的后期。从全国的范围来讲，这个时期的社会经济，比之封建社会前期有了很大的发展，而南方长江流域发展得更快，水平也逐渐超过了长期领先的黄河流域。手工业的兴盛，商业的繁荣，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使一些地区 and 行业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从政治和军事方面来说，这个阶段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也比以往各个时期更为复杂而激烈。先后兴起于北方的三个少数民族：契丹、女真和蒙古的统治者，分别建立起辽、金、蒙古及元和清等强有力的政权，他们南下进占了黄河流域，甚至建立起了统一全国的王朝。金朝灭亡北宋、蒙古灭亡金朝、元朝灭亡南宋、清朝取代明朝等一次次改朝换代的战争，以及北宋与辽和西夏，南宋与金和蒙古的长期对峙和互相交兵，都使中原地区比之南方经受了更多的摧残；而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相互联系和融合也在同一时期达到了更高的阶段。对外关系方面，在长期和平交往之后，先有蒙古帝国的远征西亚、东欧，继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从海上东来，使处于封建社会后期的中国，面临新的问题和严峻的考验。

这种形势，也使长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曾经是 10 个王

朝的京城、并且作为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000多年之久的长安，因为宋元明清时全国政治中心的东移而丧失了首都的地位，其政治经济地位随即下降，大非昔日可比，这是很明显的，也是很自然的。宋元明清时期的长安与东南地区相比，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文化方面也逐渐落后了。但是，在宋元明清时期的八九百年当中，西安地区的经济和文化还是在曲折的道路上有所前进的，而且在新时期的新形势下，西安负担起维系祖国西北和西南广大地区、保证西部稳定、屏障中原安全的重任，并因此始终受到建都东部的宋元明清各朝统治者的极大重视。在宋金时期，西安一直被称为京兆郡或京兆府，地位高于其它郡治府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始改京兆府为安西路。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正式将安西路改为西安府。从此，“西安”这一令人钦羡的嘉名便永载史册，沿用至今。

下面，我们再详细谈谈宋元明清时期的西安在军事政治方面的重要性。

宋元明清时期西安的军事政治地位是很重要的，这可以从各朝统治者的军政设施中得到充分的证明。

北宋前期，地方第一级行政区中有陕西永兴军路和秦凤路。永兴军路的辖境包括今陕西省关中、陕北的大部分地区 and 山西省、河南省的一部分地区，治所就设在西安市，当时称为京兆府、永兴军。永兴军一名是由唐代节度使辖区演变而来的，相当于后代军事管辖区的名号。唐代首都是不设节度使的。唐末昭宗被胁迫迁往洛阳后，京兆附近的军事管辖区被称为佑国军。五代的后梁改为永平军，后唐复称长安为西京，不立军名。后晋改以洛阳为西京，改长安军名为晋兴

军，后汉改称永兴军，后周和北宋都沿用这一名号，未加改变。从这些军名及其变化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的统治者对西安的军事地位是十分重视的。其后北宋与兴起于陕北、内蒙一带，势力日强，建都银川的党项羌西夏政权多次争战，长期对峙。陕西永兴军北部被分出两个名叫鄜延路和环庆路的军区，秦凤路西北也分设了两个名为泾原路和熙河路的军区，以加强对西夏的攻守力量。京兆府实际上成为支援各路军事的主要基地。

金朝灭亡了北宋以后，开始了西北与西夏对峙、南与南宋争衡的局面。因而金朝不仅把京兆府视为对抗西夏的重镇，更作为与南宋争夺汉中和四川地区的主要基地。并以关中的长安和凤翔为根据地，接连发动了和尚原、仙人关、饶风关等多次有名的大战。

蒙古窝阔台汗夺取关中后，派其弟拖雷假道南宋的汉中、安康，包剿扼潼关、黄河之险以阻蒙古东进南下、以图保河南安全的金军主力。禹县三峰山大战后，金朝不久就被迫放弃了首都汴梁，南迁秦州，为蒙古南宋联军所灭亡。蒙哥汗时期，划京兆为其弟忽必烈的封地，作为经营四川、青海、西藏甚至云南的基地。而忽必烈在元世祖的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就立即设置秦蜀行中书省（也称为陕西四川行中书省），其治所就设在京兆府。即令是在分设了四川行中书省以后，陕西行省的管辖范围也包括了今陕西全省、兰州以东的甘肃省大部 and 宁夏、内蒙古各一部。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忽必烈封其第三子忙哥剌（正后所生，长子早卒，次子真金被立为皇太子）为安西王。安西王拥兵15万，分驻京兆府和六盘山，兼辖河西、吐蕃、四川等处军民之

政。位高权重，冠于诸王。

明朝初年，也以西安为北抗元朝残余势力，南图四川的军事重镇。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封其次子朱橚为秦王。其后在讨论建都地点问题，分析南京、临濠、开封、洛阳和长安优劣时，朱元璋也认为“天下山川，唯秦地号为险固”，特命皇太子巡视关陕。而作为明代第一级地方行政单位的陕西布政使司（相当于现在的省），其辖境实包括今陕西省全境和嘉峪关以东的甘肃，以及青海东部、宁夏东南部、内蒙南部各地。

清军入关，统一全国之后，分命满、蒙、汉军八旗，镇守各省要地。陕甘省驻兵达8万多人，在各直省驻兵数目中占第一位。其他15省区驻军总数才50万人。如以具体城市而论，西安城在全国各主要城市中也是八旗驻防时间最早、驻兵数目最多的一个。早在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西安府即与江宁府同时分驻右、左四翼满、蒙、汉军八旗劲旅各2000人。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西安驻防八旗骑兵7000多名，步兵700多名。将佐和铁匠、弓匠以及眷属等还不在于内。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又增至8600多名。乾隆末年，定额西安将军所辖各级将官约400多人，骑兵、步兵、炮兵共2700多人，养育兵7000多人，铁匠、弓匠90多人，总数在万人以上。在全国各大城市中驻军数目最多。八旗之外，清朝的又一主要军事力量叫绿营。清初绿营兵屯驻的分区状况，也是以驻扎在西安的川陕总督辖境最广，统兵众多。它不仅统辖陕西、四川和甘肃等省的驻军，而且还一度兼辖山西省的驻军。到乾隆年间，始定以陕甘总督驻兰州之制。

上述宋元明清各朝关于军政方面的设施，可以看出历代统治者对西安的重视。其所以如此重视，自然是由于西安在维护全国安全与稳定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的缘故。

在城市面貌和经济文化方面，宋元明清时期的西安也有相当大的变化。

从城市面貌来说，唐末朱温迫使唐昭宗迁都洛阳时，长安的城池、宫殿、衙署和民居都遭到严重的破坏。驻防长安城的佑国军节度使韩建为了便于防守，不得不放弃外廓城和宫城，在皇城的基础上改建了长安城，当时称为新城，面积仅相当于原来长安外廓城的1/16，连长安和咸宁两县的衙署也被分别留在城外东西两侧。宋、金和元朝的京兆府、安西路或奉元路，都以这个新城为治所。不过元朝又在新城东北数里处，建造了一座辉煌壮丽的安西王府。亲见过这个王府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介绍说，京兆府“城外有王宫，即上述大汗子忙哥剌之居也。宫甚壮丽，在一大平原中，周围有川湖泉水不少，高大墙垣环之，周围约五哩。墙内即此王宫所在，其壮丽之甚，布置之佳，罕有与比。宫内有美丽殿室不少，皆以金绘饰。”明代初年，又把宋、元长安城墙分别向东、向北扩展了各约1/4，并于城内东北部兴建了规模很大的秦王府。其中“宫殿轩敞，川原亭池，极一时之丽观”。其后又把钟楼从迎祥观旧址迁建到现在的地方，使居于通往东西南北四门大街的中心点上，奠定了今天西安城的基本格局。清朝则把原来的秦王府拆迁修建了城隍庙，就其故址扩大到北大街和东大街以及北面和东面的城墙，作为八旗驻防的满城，面积约占西安城总面积的

1/3。连钟楼和东门都包括在内。此外，还在东门内的东大街之南修建了一个汉军八旗的驻防城，后来由于汉军调防而废弃了。

关于宋元明清时期西安地区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情况，史籍记载不详。但从下述几点也可以推测其大概。

《宋会要辑稿·商税杂录》载有北宋时期全国各府州及其所属县镇场务年商税收入统计，其中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以前，京兆府在长安城及各县（相当于现在的西安市及西至乾县、武功、户县，东至临潼、蓝田，北到泾阳、高陵，南到柞水、镇安各县）场务的商税年收入额为56000多贯，在全国各府州中居第17位，在黄河流域各府州中居第10位。熙宁十年，京兆府的商税收入额上升到83000多贯，跃居全国各府州的第11位，黄河流域的第5位。如果不算各属县场务而以各府州在城，也就是治所的每年商税收入额而论，熙宁十年长安城的商税收入额为38000多贯，在全国各主要城市中居第16位，在黄河流域各城市中居第5位。这说明北宋时期西安地区的商业发展水平，不仅在全国各府州、各城市中仍处于先进行列，而且其发展速度仍然也是名列前茅的。而商业的繁荣程度，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大致情况。元代西安地区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情况，马可·波罗在其著名的游记中描写道：“离上述之哈强府（当为河中府，即今山西永济县的蒲州故城）城后，西向骑行八日，沿途所见城村，皆有墙垣。工商发达，树木园林既美且众，田野桑树遍布，……土产种种，禽鸟不少，可供猎捕、畜养之用。骑行上述之八日程毕，抵一大城，即前述之京兆府是也。城甚壮丽，为京兆府国之都。……惟在今

日，则由大汗子忙哥剌镇守其地。……此城工商繁盛，产丝多，居民以制种种金锦丝绢。城中且制一切武器。凡人生必须之物，城中皆有，价值甚贱。”由此可见，宋金元时期，西安地区的种桑养蚕和丝织业仍具有相当的规模。但在此后，蚕桑和丝织业就大大衰落了。这种变化除政治、军事、经济原因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从元代初年起，关中地区开始引种棉花，并很快得到推广，种桑养蚕和丝织业逐渐为植棉纺织业所取代。这对明清时期西安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和变化，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另外，曾在陕西作官的张瀚在其所著的《松窗梦语》中介绍西安地区的商业情况说，关中“山河四塞，昔称天府，地方驴马牛羊，旆裘富丽，自昔多贾。西入陇蜀，东去齐鲁，往来贸易，莫不得其所欲。”清代更是“城内辐辏交午，阊阖崇比”，“五方杂处，商贾云集”。“子午峪、石鳖峪道通兴汉，商贾络绎。市多椎酤，最易藏奸。”至于西安府城商业区的分布，则是明代集中于城内的西部，清代又发展到东关。

人口的增减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一个城市的经济盛衰，商业荣枯。而宋元明清时期西安人口的发展过程，也是几经起落，变化巨大。据统计，唐代极盛时期的玄宗开元、天宝年间，长安城有人户8万，京兆府有户36万，口196万。经过唐末五代战乱，北宋初年恢复，到宋神宗熙宁年间，长安城的户数已有“数万家”。京兆府的总户数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为9万多户，宋神宗熙宁年间为11万户，元丰年间为29万户，徽宗崇宁年间为36万户，已相当于盛唐时期的水平了。西安地区100年间人口增长了3倍，说明其发展速度也是相当惊人的。其后，宋金交兵，关中残破，户

口凋零。金朝时在黄河流域的统治比较稳定，在户口最盛的金世宗大定年间，京兆府12县的户数将近10万。金元时期，战争更加频繁而激烈。蒙古蒙哥汗在位时期，比唐代和宋代的京兆府辖区大一倍的奉元路才有3万多户，27万口。同时期的另一统计资料则说关中“八州十二县，户不满万”，可见户口损耗之甚。从元代到清初，和全国发展的总趋势一致，西安地区的人口也有几次回升、下降、再回升、再下降、又回升的曲折过程。康熙年间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以后，西安地区户口增加的趋势更为明显。到乾隆时期，共治西安府城的长安、咸宁两县已有男女大小近60万口。嘉庆时期变为8万多户，53万多口。道光初年又回升到57万多口。光绪末年降为37万多口，宣统年间又回升为10万多户，近50万口。其间两次下降，当与清朝统治者镇压白莲教起义和回民起义的战争与各项暴政有关。总的看来，西安地区户口数字的升降起伏，也是与当时全国户口升降的总趋势、与全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总趋势、以及西安在全国的政治经济地位密切相关的。

谈到文化方面，宋代是理学兴盛时期，著名的濂、洛、关、闽四大家中，关学的创始人就是籍属长安的著名唯物主义哲学家张载。其后关学也代有传人。文学方面，明末武功康海、户县王九思都以音乐和戏曲知名。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元代马可·波罗曾谈到西安居住着“一些基督教徒、土库曼人和撒拉逊人”。明代末年，西洋耶稣会教士东来，曾在西安城内建筑教堂，传播天主教，足迹甚至远至关中和陕南的偏僻山区。久居三原和西安的泾阳著名科学家王徵，就信仰了天主教，并向耶稣会教士学习拉丁语和西洋科学技术，

翻译《远西奇器图说》，编印《西儒耳目资》，撰著《诸器图说》、《诸器图说小稿》、《藏器图说小稿》和《畏天爱人极论》等书。对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中外思想文化的交流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总之，在宋元明清时期，已经失去了首都地位的西安，在全国的政治、军事地位仍然是极其重要的。西安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也都是有所发展的。当然，就其发展趋势、发展水平和在全国的地位而论，的确是既比不上秦汉隋唐时期的长安，也逊色于东南地区的一些新兴的都市了。正因为如此，在我国历史由古代转上近代的征途时，西安就显得有些起步较晚、起点较低、发展速度也比较缓慢了。



北宋与西夏在陕西的对峙

王志平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北宋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范仲淹的这首《渔家傲》脍炙人口，传为千古佳作。它以慷慨雄放之声，把我们带到了北宋与西夏政权在陕西对峙、战马嘶鸣狼烟烽起的年代。

西夏，是宋人对党项羌贵族所建大夏政权（公元1038—1227年）的称呼。羌族早在远古时期就游牧于我国西北部地区。唐朝末年，党项羌首领拓拔赤辞降唐，唐封其为西戎州都督。后其首领拓拔思恭出兵助唐镇压黄巢起义，随李克用攻占长安。唐以夏州（今陕西靖边白城子）为定难军，封拓拔思恭为该军节度使，进爵夏国公，赐姓李。从此，党项羌便据有银（今陕西横山党岔东）、夏、绥（今陕西绥德）、静（今陕西靖边县治附近）、宥（在今陕西定边县境）等5个州的地区。拓拔思恭的子孙相传到了宋代，其首领李继奉投附宋朝，但其弟继迁不愿归宋，率所部自银州逃往夏州东北，抗宋自立。公元1004年，继迁死，子德明立。继迁、德明先后以银、夏等州为基地，不断扩展势力，奠定了割据自